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意蕴

□ 杨菁 周嘉

2023年10月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文化建设方面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内涵十分丰富、论述极为深刻，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文化思想与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深邃思考新时代中国的文化发展、文化强国建设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等重大命题，充分彰显出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意蕴和理论智慧，为我们提供了深厚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南。

一、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两个结合”的重大成果

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两个结合”的重大成果，不仅是对我国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的深刻反思和总结，更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创新和发展。“两个结合”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第一个“结合”，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最早提出于1930年。毛泽东同志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遵义会议真正开启了“第一个结合”的新征程，是第一个“结合”的逻辑起点。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这次会议批判了教条主义”。我们的百年党史其实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不断中国化、不断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史。

在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同时，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是我们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行理论创新的显著优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华民族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华民族的生生不息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随着时代变迁和社会发展，传统文化也需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习近平文化思想正是对这一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强调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倡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只有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才能使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同时，习近平文化思想也注重吸收借鉴世界文明的有益成果。倡导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尊重各国文化差异，推动世界各国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种开放包容的文化观念，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宽广视野和人类情怀。在实践中，习近平文化思想已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推动了全国范围内的文化繁荣和发展，促进了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同时，也增强了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一样？为什么能够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关键就在于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的关键就在于‘两个结合’。”一方面，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深入发展，为中国社会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推动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人民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发展道路。这条道路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灿烂文明，同时又广泛吸收了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现代化路径。尊重历史，珍视传统，但又不被传统束缚，敢于创新，勇于变革。另一方面，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丰富的土壤，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和独特的社会实践，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以生根发芽，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习近平文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又一理论创新成果，不仅是对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重要推动，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在与中国的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不断吸收中华文明的智慧，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不仅指导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也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新的经验和启示。

二、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的一系列重要理论观点和方法论原则，而且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首先，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了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之间的辩证关系。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规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因此，在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之间，必须相互协调、相互促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根本上说，文化是由经济决定的，经济力量为文化力量提供发挥效能的物质平台。”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论述，不仅明确了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也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我们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文化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条件。同时，在文化建设方面，我们坚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我们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其次，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了文化的主导性和多样性的辩证关系。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文化作为社会意识的一种形式，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意识形态性，所以社会主义文化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一元主导性地位。在这里指要在坚持“一”的主体条件下包容“多”的差异和价值。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一元主导，是由社会主义性质和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决定的。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比作“香花”并指出：“无论在党内，还是在思想界、文艺界，主要的和占统治地位的，必须力争是香花，是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文化思想同样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主导性，然而，这种主导性并不意味着文化的孤立和封闭。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同时，又强调汲取不同思想文化的价值。各种文化在交流和碰撞中，通过借鉴、融合和创新，形成了各自独特的文化特色和风格。文化交融不仅丰富了文化的多样性，也推动了文化的进步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从中华文化内在规定性出发，强调中华文化本身就是一种多元文化的集大成，“是由多元文化汇聚成”的共同文化，并进一步强调挖掘多样文化的重要价值。一方面，文化的主导性是文化多样性的基础。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导性，才能在多元文化的交流中保持自我，不被其他文化所同化。另一方面，文化的多样性又反过来促进了文化的主导性。通过与其他文化的交流和比较，我们可以更深入地认识和理解自己的文化，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自己的文化主导。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注重文化的主导性和多样性方面，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两个结合”，重视传统文化传承创新，尊重和保护各民族文化，同时也倡导文化交流与融合，促进世界文化的共同繁荣与发展。

三、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人民立场，丰富与发展马克思主义人民史观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人民史观的丰富与发展，这一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强调文化建设要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新时代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立场。马克思主义强调：“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人民群众在文化发展中占有着主体地位，是文化发展的依靠力量，以及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是中国人民创造的。”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过程中，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立场不仅是我们坚持的核心理念，也是我们行动的根本指南。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以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推动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要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发挥人民的首创精神，让人民成为文化创造的主体，让文化成为人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动文化创新，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文化。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立场，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有力的措施，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和文化保障。

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文化发展的人民中心地位，注重文化的社会功能和教育功能，强调通过文化自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文化产业发展等途径，推动社会的稳定和繁荣，培育人民的正确价值观和世界观，促进个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文化不仅具有娱乐休闲的功能，还具有塑造价值观念、传承民族精神的重要作用。因此，在文化建设中，既要关注人民群众的休闲娱乐需求，也要注重通过文化活动和作品传递正能量、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此外，教育也是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要通过各种形式的教育活动，提高公众的文化素养和审美能力。文化的建设和发展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四、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丰富和发展

习近平文化思想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发展，将文化与人的实践活动相结合，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立足时代特征进行文化建设。一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了文化的实践本质，认为文化是人在社会实践中的创造物，也是社会精神生活的体现。这种理解突破了传统上对于文化作为单纯精神现象的局限，将文化与人的实践活动紧密结合起来，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另一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倡导从鲜活的社会实践中把握文化建设的方向和目标，从变化发展的社会实践中汲取文化发展的理论营养，思考文化建设的实践要求。这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论，既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也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习近平文化思想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基础上，结合新时代的实际情况和实践要求，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和创新。这一思想和行动不仅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发展，也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作者单位：凯里学院）

岑巩县水稻制种产业调查研究

□ 李月莹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岑巩，这不仅是一句口号，更是实实在在的发展之路。水稻制种产业的飞速发展，成为岑巩县域经济增长的重要推手。

一、岑巩水稻的变迁历程

1976年，岑巩的制种先驱们远赴海南，引进了杂交水稻制种技术，开启了岑巩水稻制种的新篇章。经过47年的坚守和不懈努力，岑巩水稻制种产业实现了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的精彩蝶变，发展成为该县的一张靓丽名片。2023年，岑巩县水稻制种面积进一步增长至3.81万亩，产量超过830万公斤，面积和产量在全国34个国家水稻制种基地中位列第二位，跻身水稻制种产业第一梯队。被农业农村部认定为“国家级水稻制种大县”。通过统一规划布局、统一流转土地、统一社会化服务，岑巩县不断提升种子生产的集约化水平和基地生产能力，有效推动了水稻制种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作为区域农业发展的关键力量，岑巩县在水稻制种领域取得的显著进展在提升自身产业竞争力的同时，还通过技术支持、经验分享和资源共享，有效带动了邻近县份如镇远、三穗的技术提升。实施“育繁推”一体化战略和“县企共建”模式，推动制种全产业链的进程，促进了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此外，该县还通过提高收购价格、推广轮作等措施，不断增强企业和农户的抗风险能力，持续提升农民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

在追求产量和效益的同时，岑巩县也未忘初心，致力于引进和培育适应当地环境的水稻品种。通过精心选择如F优498、九优27等耐病性、抗逆性强的品种，确保了即使在极端气候条件下也能保持稳定的产量。

二、科技与传统的双重奏

在岑巩县，稻农们巧妙地将传统种植智慧与现代农业科技相融合，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古今融合”模式，这不仅体现在采用自然农法和有机肥料保持生态平衡的农业实践中，还通过利用现代灌溉系统提升水资源使用效率，深入到文化层面，保留传统节日和仪式以加深社区成员之间以及他们与土地之间的情感纽带。此外，智能农业管理系统、精准化农业技术如土壤分析、GPS定位和遥感技术，以及分子育种和基因编辑等先进种子科技的应用，极大地提升了农业的效率和产出。这些科技创新可以减少对化学肥料和农药的依赖，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通过信息化和网络化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农民更容易获得市场信息、气象预报和农业技术，推动了农业生产的智能化和现代化。

三、水稻产业的国际化之路

岑巩县在尊重自然规律、合理利用和保护自然资源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推动了水稻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还助力了其产品的国际化。通过深入分析气象数据以精确预测天气变化，进而优化播种和收割计划，减少了气候变化对水稻产出带来的风险。同时，在推广节水灌溉和有机肥料使用等生态农业和可持续农业实践中，保护了生物多样性、提升了土壤质量和农作物健康、增强了农业系统的抗逆性和自我修复能力。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等国际合作渠道，岑巩县将其水稻制种技术和产品推向国际市场，与多国建立了技术和合作关系，增强了岑巩县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促进了技术和管理的持续进步、也加强了国际友好关系，为未来的广泛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四、未来的发展展望

岑巩县在新的征程上正全力以赴，立志将水稻制种业推向更高水平。在追求产量和品质提升的同时，县里还致力于实现可持续和全面的发展。通过集中化改造大型种植区域、引入“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创新合作模式，并采取“反租倒包”等新策略，旨在扩大生产规模，提高农业效率，并激发各类主体的参与热情和创新精神。整合产业链上下游资源，并吸引多方参与，成为推动产业创新和保障长期繁荣的关键。

为了从“制种大县”向“制种强县”的转变，岑巩县正在实施多项关键措施。建立专门的水稻制种保护区确保种植安全，与科研机构合作培养人才，以及推行“县企共建”模式，促进全产业链的协同发展。这些措施可提升农户的收入和抗风险能力，有效的市场策略和保险机制，确保农业的长期可持续性。岑巩县还积极促进技术和资源的共享，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共同打造强大的区域性种业中心。

在这片古老而又生机勃勃的土地上，每一粒稻米都不仅仅是食物，它们是文化的载体，是智慧的结晶，更是通向广阔世界的金钥匙。岑巩县的水稻，正以其独特的魅力，让世界感受到来自中国东南边陲的温暖与力量。

（作者单位：中共黔东南州委党校）

国内关于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研究现状

□ 夏睿志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为弘扬红色文化，加强党性教育，促进长征时期革命旧址进一步开发利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近年来，国家一直重视和支持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贵州将建设好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贵州段作为政治工程、文化工程、民生工程、党建工程推进，建立起“内容建设、规划指导、政策支持、资金保障、数字在线、工程实施”六大板块工作机制，加强规范指导和工作落地实施。2019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此方案对于以长征、长城、大运河一系列主题明确、内涵清晰的文物与文化资源如何生动展现其价值和特色，以促进保护、利用、传承进行了基本规划。2021年国家文物局印发的《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十四五”专项规划》和贵州省发改委印发《贵州省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条例》，以及2022年12月文旅部和国家文物局共同印发《支持贵州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都不断对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贵州段）的建设提出了新的方案和要求。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整体规划上，主要分为六个功能区：管控保护区、传统利用区、文旅融合区、核心展示区、集中展示带和主题展示点。每个功能区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与开发过程中都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与功能。

一、国家文化公园的学术研究情况

国家文化公园是国家推进实施的重大文化工程，是不同于国家公园及各类文化保护空间的新型功能载体，主要有长征、长城、大运河、黄河、长江五大主题公园。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于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的研究主要也是围绕这五大主题类型展开的。

通过中国知网数据库搜索“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关键词来看，总库共182篇相关研究，其中学术期刊84篇、学位论文11篇、报纸类44篇、学术会议有4个。2019-2021年期间，“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研究呈逐年增长趋势，尤其在2020-2021年期间，学术界有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研究增长幅度最大，2022年和2023年则有了略微下滑。

二、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研究主题讨论与分析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总体范围主要涵盖了红军长征时期经过的15个省区市，目前现有研究中主要集中于贵州、江西、广西、四川等地区。对于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研究话题主要集中于基本建设与规划、建设管理体制、红色旅游发展、思政教育、博物馆学建设等方面。

（一）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基本建设与规划研究

关于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基本建设与规划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规划建设当中，要注重区域间资源的整合，加强区域间的联系与协调发展；2.要有效突出当地主题和特色；3.要做好立法等前提工作，确保一定的法律保障。

目前关于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与规划的研究，其中以贵州地区的居多，主要有以下研究：陶通艾在《湄潭建设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思考》中对湄潭县长征文化资源的特色和建设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优势进行了简要分析，并认为湄潭在建设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路径工作中应该从红色精品旅游路线的规划与完善、开发主题公园两方面来进行思考。周扬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规划编制要点思考——以遵义会议-四渡赤水集中展示带规划为例》中从资源梳理、主题定位、规划重点、管理措施等方面系统分析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规划编制要点，为同类线性文化公园编制规划提供一定的参考。

（二）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管理体制的研究

关于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管理体制的建设和完善，大多学者普遍认为主要在于区域协调发展机制建设和提高文旅融合发展力度两方面。笔者认为具体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1.制定完备的法律、政策、部门机构体系，以进一步确保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在保护规划、资源整合与利用、长征红色文化传承、区域协调与发展等方面得到充足的保障。2.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沿线各地区需要培养专业的管理团队，当地可以通过与附近高校、研究所等机构合作建立人才培养基地，培养一批在旅游管理、信息技术管理、红色资源维护等方面的人才，形成一支完整且系统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专业管理体系。3.各地区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运营过程中可以适当借助企业的力量，实行政企分离的运营模式，从而进一步促进文旅融合发展，同时区分好公益化与市场化的关系。

（三）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背景下红色旅游发展的研究

建设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是发展和带动红色旅游的重要手段。如何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背景下发展红色旅游，主要应该从红色旅游开发路径、影响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沿线地区红色旅游的因素、红色文创产品开发、红色景区游客四个方面展开。

（1）关于如何利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背景深度开发红色旅游，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完善和加强：1.专业人才团队的建设；2.产业、资源的融合；3.打造区域特色品牌。如龙见福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为视角，对黄平长征文化传承与发展主要体现在研究管理投入、开发利用程度以及长征文化资源统筹方面。

（2）关于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背景下影响红色旅游发展的因素，主要在于物质与经济发展情况、红色旅游资源情况、市场竞争力、政府支持度以及知名度等几个层面。此外，王兆峰运用平均邻指数、核密度分析法，探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沿线红色旅游景区空间分布格局及供给水平，分析影响红色旅游景点高质量发展的因素是现有相关研究中的一大亮点。

（3）关于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红色文创产品的开发，需要注重以下几个方面：1.与当地地域特色深度融入；2.加强产品实用性和耐用性；3.转变和创新营销模式与思维；4.转变红色教育的模式，开发具有趣味性的主题活动，达到寓教于乐的效果，增强公众参与性。如韦曦认为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文创产品设计中在地域特色、实用性、产品交互理念以及消费者需求方面存在一定的问题，并据此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徐慧、袁柳、胡平等人结合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四川段川西片区建设的优势与存在问题，提出应该遵循综合效益原则，以红色文化为主题，融入川西地域文化；最重要的是要利用互联网等新媒体扩大宣传，创新营销思维和方式。

（4）对于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沿线地区红色景区的部分游客主要集中于对游客满意度的调查。旅游体验正向影响旅游情感，旅游情感通过文化依恋和功能依恋影响，以“旅游体验-旅游情感-文化认同”的路径，增进游客对国家的认同。刘孝蓉、祝旭利用ACSI模型对遵义会议会址游客满意度进行了测评研究，通过设置满意度评价指标，测评出了游客对于遵义会议会址各评价指标的满意度，对推动国家文化公园文旅融合提供借鉴思路。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无论是从总体规划路径着手研究，还是从文创旅游产品、游客体验、游客认同等微观层面入手研究，核心始终在于思路创新。

（四）关于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与思政教育相融的研究

关于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如何与思政教育有效融合，核心主要在于学生内在体验价值的提升，具体应该从以下两方面着手：1.改变传统思政教育的模式，以提高文化价值体验为主，将长征文化与精神以一种全新的，活态的形式传播出来，让学生、党员等群体获得更多的内心体验，增强文化认同感。2.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沿线地区要加强思政教育与学校课堂的有机结合，尤其是对于沿线地区高校专业课教育来说，要适当穿插长征精神的相关元素在其中。

（五）关于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中博物馆学建设的研究

目前学术界关于将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与博物馆学领域结合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以下几个方面：博物馆展陈，社教活动体系，运营、宣传的方式与手段以及博物馆品牌打造。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目的是促进乡村振兴，推动长征文化数字化传播，因此研究主体以乡村博物馆和数字博物馆两种博物馆类型为主。

首先是关于乡村博物馆的研究：刘淼、周子云以龙胜白面瑶寨博物馆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其建设现状及问题，提出了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背景下乡村博物馆建设的五种优化路径：1.建构社区共营模式；2.社区居民参与推动博物馆展陈更新；3.构建博物馆教育服务体系；4.运用“互联网+”技术，更新宣传手段和方式；5.打造品牌村落，助力乡村振兴。

其次是关于数字博物馆内容构建的研究：江玲、周境伟等以新博物馆学理论为视角，采用访谈法对相关游客群体围绕“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数字博物馆内容构建”进行深度访谈，并对访谈内容进行整理，认为主要围绕网站环境、互动体验、教育功能以及资源内容4个范畴展开。

总的来说，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背景下发展博物馆事业，核心在于增强博物馆直观体验感，以及运用新博物馆学理论与方法增强与社区居民的联动，从而给予观众最佳内心文化认同，增强文化自信与民族自强。

三、研究展望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是进一步促进革命文物得到保护和利用的最佳契机。革命文物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物质载体，而做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作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过程中的关键一环。目前学术界关于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视角下保护革命文物方面的研究还相对较少，这也是未来值得学术界进一步展开和讨论的话题之一。

首先，长征遗址点的串联是有必要的。笔者认为适当拓宽黎平周边各长征遗址所在红色村镇到黎平县城的公路，并在路途中设置一些带有红色元素的指示牌、路标等。在红色特色公路的修建中划分专用跑道，通过适当组织一些跑步或行走爱好者举办以红色为主题的体育比赛活动，让普通群众在体育运动中感受历史，让长征文化和精神在体育运动中得以传承，促进体育健康产业与红色文化产业深度融合的方式。

其次，对于长征遗址点局部的开发和保护。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本质在于红色文化的主题得到进一步凝练和挖掘，深度融合当地特色。因此，建设长征数字体验展厅，是进一步促进馆址联动，进一步挖掘和凝练长征精神主题的必要之举，也是促进贵州大数据产业最大化开发和利用的重要之措。此外，可以进一步加强对各遗址点发生的红色故事以年轻化的方式传播，例如可根据相关故事编纂红色剧本，深度将沉浸式文旅产业与红色文化产业融合，实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下革命遗址最大化开发和利用。

（作者现就读于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